

《古今韵会举要》版本系统比较 及其元刊本面貌考

A Comparison of the Editions of *Summary of Chinese Rhymes* (*Gujin yunhui juyao*)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Yuan Manuscripts

耿军¹

Jun GENG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gengjun@swu.edu.c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4784253>

摘要 《古今韵会举要》版本流传甚广，系统梳理目前所见馆藏各版本情况，理清各版本基本面貌，并综合选取 12 种版本，从内容异同的角度分析出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驹泽本、荟要本为一系，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文渊本、淮南本为一系，五山本是较为特殊的一系。根据内容细节证明元刊本系统较为一致且皆为修补本，原因在于本就没有余谦新刊本，余谦本实际是在陈宗刊本的底本上进行的修订；陈宗刊本仍存于余谦刊本、各类明覆元刊本、朝鲜覆元刊本以及日本覆元刊本中。结合元刊本、明刊本，离析五山本内部有关内容，可还原陈宗刊本（元刊未修本）内容系统的面貌，从而将其从余谦刊本中剥离出来。

关键词 《古今韵会举要》；版本系统；元刊本

Abstract The editions of the *Summary of Chinese Rhymes* (*Gujin yunhui juyao*) are widely spread.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library collections, sorting out their basic features, and comprehensively selecting 12 editions, from the angle of conte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at the Shanghai Library edition, the Imperial Library edition, the Kyujanggak edition, the Korean edition, the Komazawa edition, and Hui-yao edition are one series, whilst the Ming-manuscript edition, the Taipei edition, the Jiangxi edition, the Imperial Wenyuan Library edition, and the Huainan edition are one series, the “Five Mountain” edition is a special kind of vers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details, it was proved that the system of the Yuan editions is more consistent and all are composite editions because there is no new edition compiled by Yu Qian (fl. 1339). Chen Bao’s edition is the base of Yu’s edition, all kinds of Ming editions copied from the Yuan edition, Korean editions copied from the Yuan edition, and Japanese editions copied from the Yuan edition. Combined with the Yuan and Ming editions, analyzing the internal contents of the “Five Mountain” edition, the systematic appearance of Chen’s edition (an unrevised edition of the Yuan edition) could be restored, thus separating it from Yu’s edition.

收稿日期：2023-05-29

作者简介：¹ 耿军，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古今韵会举要》多版本综合研究”（项目号：19BYY149）；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元明汉语语音演化研究”（项目号：SWU1809111）。

Keywords Summary of Chinese Rhymes (*Gujin yunhui juyao*); Version System; Yuan Manuscript Edition

引言

《古今韵会举要》(简称《举要》)卷帙浩繁,内容广博,有重要的文献学、语言学价值,为历代学者及藏书家所珍视。

《举要》海内外存世藏本不少,中国、日本、韩国等都有不同版本收藏。《中国古籍总目》收录元刻本两种,明刻本10种,元刻明修本1种,清刻本1种;李添富(1990,2007)统计中国台湾地区有13种23本藏本;住吉朋彦(1997)介绍了12种各类版本及相关传承情况;范月珍(2019)指出《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收元刻本3种,元刻明修本1种,明刻本10种。“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目录联合导航系统”、中国台湾“数字典藏联合目录 Union Catalog of Digital Archives, Taiwan”“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有数位化数据。

《举要》海内外馆藏著录信息颇详,宁忌浮(2000)主要通过文献著录及馆藏情况,对《举要》的版本作了简要介绍;李添富(1990,2007)主要根据馆藏信息,对《举要》的版本著录情况进行了详细列举和介绍;范月珍(2019)主要通过书目文献著录情况,结合馆藏信息,对元刊本和“㊂”字本的问题进行了离析,进而对《举要》的版本系统进行了梳理,对一些文献著录错误问题进行了辨正。

本文根据文献著录以及馆藏信息,结合具体所见的各本内容,对《举要》的收藏及版本信息进行归类介绍,比较各版本内容的异同,分析版本系统,还原元刊未修本的面貌。

一、《举要》版本概述

李添富(2007)详细介绍了元刊本2本,明覆元刻本6本,明刊黑口本3本,明嘉靖十七年江西补刊本3本,天禄琳琅明翻刻本1本,明嘉靖间朝鲜刻本1本,朝鲜覆元刊本1本,应永五年日本重刻本1本,日本庆长活字本1本,日本重刊本1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本,摛藻堂四库荟要本1本,光绪九年淮南书局重刊本1本,共计13种23本;范月珍(2019)介绍了元刻本3种,明翻元刻本1种,明刻本1种5版,明嘉靖六年郑氏建阳宗文堂刻本1种,明嘉靖十五年秦钺、李舜臣刻本1种2版。综合目前所见各类书目文献及馆藏信息,我们选取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版本择要进行介绍。李添富(1990,2007)、住吉朋彦(1997)、范月珍(2019)等已经详细介绍过的且与本文稍显无涉,则略去或只简略介绍。

(一) 元刊本

从文献价值以及研究价值来看,元刊本当然是最重要的。目前所见的元刊本有限,我们看到的主要有:

- 1.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简称上图本。范月珍(2019)称为元刻本一。该本20册30卷。半页8行,小字双行22、23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陈宗禁约四周双边,无栏线。内容顺序为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宗禁约、凡例,通考、正文。¹无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

¹ 本文所言“内容”特指《举要》全书所含各板块;“正文”指的是《举要》所言“卷一”至“卷三十”中的字头及注释文字,

后有清人王兆瑚手跋：“此书为先侍御鹤皋公所传，侍御又得之石田山人，流传已久，宜加珍惜。丙辰元旦兆瑚识。”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刻本，简称静嘉本。该本与上图本为同一版本，可能属不同印次。该本16册，体例、内容等与上图本一致。

上图本与静嘉本版面都较为清晰，虽偶有墨迹晕染，但不影响阅读。二者版面皆有所缺失，如上图本卷五最后一页至卷六目录及首页4页缺失，没有修补或替换；静嘉本内有多处虫损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缺字或缺页，用手写替代。上海图书馆古籍数据库、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汉籍库皆有电子版可供阅读。

日本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亦有一藏本，简称内阁本。为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所收藏。该本行款、内容等与上图本、静嘉本一致。另外，上图本纸质较白，字迹清晰纤瘦；内阁本纸质偏黄，字迹清晰但略显粗黑。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文库可供在线阅读或下载。

2.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刻本，简称宫内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其中28–30册即为此本。该本半页8行，小字双行22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陈宗禁约四周双边，无栏线。内容顺序为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宗禁约、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凡例、通考、正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简称国图本。该本与宫内本为同一版本，但当属不同印次或补板的版本。国内其他图书馆，如上海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都有收藏。《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2005）所选即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范月珍（2019）称为元刻本二。该本是目前所见收藏最多、最为常见的元刊本。该本体例、内容等实与宫内本无差，以宫内本时间较早（吴国武，2012）。各馆藏本虽内容与宫内本一样，但仍有所不同，主要在修版刷印时间、序跋附文次序以及书籍装订册数上有所区别（吴国武2012），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32册，上海图书馆藏本为24册，¹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为16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31册。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皆有电子版可供阅读。

3.北京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藏元刻本。范月珍（2019）称为元刻本三。据范月珍（2019）介绍，该本半页8行，小字双行23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可惜两馆所藏皆为残本，其中北大藏本存卷三至三十，有抄配；山西省图书馆存卷五至二十八，其余部分配国图本。

以上上图本、静嘉本与内阁本，宫内本与国图本皆为全本，从研究价值来看，当为首选。

（二）明刊本

《举要》明刊本较多，且系统似乎较为复杂，文献目录及馆藏信息多有舛误之处，综合所见馆藏信息及有关研究文献，我们作如下梳理：

有时也作“正文内容”。

¹ 上海图书馆藏本有清钱大昕、袁克文跋。

1.安徽大学藏明刻本。著录为元(或明初)覆刻元陈寔本,范月珍(2019)称其为明翻元刻本,并指出该本半页8行字不等,小字双行,上下黑口,左右双边。陈寔禁约页左右双边。书牌四周双边,无栏线。序和通考有元陈寔刻本风格,也是明刻本中唯一一部没有天干号的版本。该本暂未得见详细内容,故只列述于此。

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覆明刻本,简称明刻本。该本20册30卷。半页8行,小字双行23字,黑口,左右双边,对鱼尾,题名下有天干号。陈寔禁约页四周双边,牌记四周单边,有栏线。内容为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寔禁约、凡例、通考、正文。范月珍(2019)认为该本当是带甲子等天干的最早版本,首次在题名卷次下镌刻天干号,之后明代的所有版本都延袭了这一做法,将三十卷正文分为十个部分,用天干号表示,数卷一个号,天干号刻于分卷的第一卷题名页下,即卷一、三、五、八、十一、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八题名下分别刻有甲乙至壬癸十个字。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可供在线阅读。

据范月珍(2019)介绍,与明刻本同为一版不同印次或补板的版本还有: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重修本。该本行款同明刻本,补板页可参见《凡例》3-7页。根据补板字体推断,此次补板时间在嘉靖前后(范月珍2019)。

上海图书馆藏明刻递修本。该本内容行款同明刻本。16册30卷。8行,小字双行,大字一约当小字四,行22字不等,左右双栏,版心黑口,双鱼尾,上鱼尾下方记卷第,下鱼尾上方记页次。内容顺序有所不同,为刘辰翁序、熊忠序、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凡例、通考、正文。该本有多处补板(范月珍2019)。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递修本。该本为明万历二十八年温陵许国诚润州公署重修本,行款同明刻本,有许国诚序文。范月珍(2019)指出此版在明刻递修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补板,重庆图书馆亦有藏本,印刷时间当晚于国家图书馆藏本。以重庆图书馆藏本为例,该本基本内容顺序为许国诚序、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寔禁约、凡例、通考、正文。

南京图书藏明刻递修本。范月珍(2019)指出该本行款同许国诚重修本,补板页与万历本相同,但未见许国诚序文,疑为万历版失序印本或印后失序。浙江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有收藏;台北“中央图书馆”亦有收藏,且有电子版可供在线阅读。

上述所列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重修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刻递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递修本、南京图书藏明刻递修本,皆称为明递修本。综合比较可以发现,各明递修本的行款与明刻本相同;它们之间最明显区别就在于补板情况的不同;内容顺序也没有明显规律,作“刘辰翁序、熊忠序、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凡例、通考、正文”者,或作“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寔禁约、凡例、通考、正文”者,两种都有。故而,可以说所有明递修本皆为明刻本不同时期不同补板的修补本。范月珍(2019)已经指出多处补板的情况,不再赘述。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细节上的证据,比如刘辰翁序言中有“谓天为

“七年切”一句，明刻本与元刊本同作“谓天为七年切”，而明递修本则多作“谓天为_七^{（七或）}_伦年切”。元刊本平声上四支韵幺夷切有：黟，《说文》：黑木也。又县名，属歙州。《集韵》或作黝、黓。黓，明刻本、明递修本则多作误作“黠”。

李添富（2007）录台北“中央图书馆”藏01115、01116、01117号黑口本，指出“三本其实一也，只以各有缺漏，以致所见略有不同。三本内容皆有所缺失，据他本补缀完整。”这一说法不错，但也不准确。我们看来，这三者同样是明递修本系列，01115号缺序言，且不论，01116号作“谓天为_七^{（七或）}_伦年切”，而01117号作“谓天为七年切”，是有一定区别的。再看著录为明覆元刻本的01110—01114号，我们发现，除01114残缺较多，无法辨识外，余本刘辰翁序“谓天为七年切”句皆作“谓天为_七^{（七或）}_伦年切”，显然也与明递修本一样。因此，从行款来看，明递修本与明刻本确实无大差别，说它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是可以的。

3.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覆元刻本，简称台北本。这是李添富（2007）提到的与别的版本不同的01113号，他说“案此本乍视之以为其与一一〇为同本，其实非也。”此本10册，30卷，行款、内容顺序、刘辰翁序言“谓天为七年切”句等皆与无许国诚序文之明递修本同。李添富（2007）所言并非无据。上文提到的“黠”字，此本与01115同作“黠”，而余下01110、01111、01112、01116、01117字迹或有不清，但基本可以看出当作“黠”，同明刻本。另外，在板面上，该本与明递修本在相同地方存在补板或断板痕迹，比如卷一目录上半部缺失，只留下“要”字“四女”部分、“卷之一”“㊂”等字样，这是明刻本及各明递修本的重要特点之一。¹因而，我们可以判断01113号虽仍属明递修本系列，但又有所不同，可以算作一个重要的参考版本。

当然，从整体内容系统上来看，台北本与明递修本仍算一系，即今文献馆藏信息著录的所谓“黑口本”“明覆元刻本”“明刻重修本”“明刻递修本”等，皆是明刻本在不同时段的补修本，只是从个别细节处存在差异而已，而这些差别对于鉴别其他版本是有参考价值的。

另外，所有明刻本、明递修本、台北本与元刊本的区别，除了内容方面，在刘辰翁序和熊忠序的字体上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元刊本上图本、宫内本等刘辰翁序为草书，字体一致；而明刻本、明递修本、台北本虽亦作草书，但字体与上图本等明显不同²；上图本、宫内本等的熊忠序为同样字体的行书，与刘辰翁序字体完全不一样；而明刻本、明递修本、台北本的字体则与它们前面的刘辰翁序字体风格一样，显然为同一人手书。

4. 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六年郑氏建阳宗文堂刻本。该本页10行，小字双行22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有天干号。陈宗禁约书牌页尾有“书林郑氏重刊”字样。牌记格式不遵旧式（范月珍2019）。

¹ 明刻本此处清晰可辨，但补板痕迹亦很明显，比如要。其他各明递修本情况类似，有的基本可辨，有的甚至脱落明显，比如台北“中央图书馆”明覆元刊本01110作要、01111作要、01112作要、明刊本01115作要、01117作要，总之皆有明显脱落或修补痕迹。而目前所见各元刊本此处并无任何修补痕迹。

² 明刻本刘辰翁序“而不敢易，犹聋耳而信目。连璧也，而不相往来，不知韵者出于律律之生也。有合故律，“娶妻”清浊易知也半，未易知也半，又半如双生必有所从受，不可紊也。故文家尚意，党知律之子母，则得之韵者犹未生前。吾尝欲谱以著邵氏《皇极经世》之所由生，而病”两页纸内容字体不同，当是他人另抄补的。

5. 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秦钺、李舜臣刻本。10册30卷，8行，小字双行23字，黑口，左右双边，有天干号，无陈宗禁约。有嘉靖十五年张鲲序（范月珍，2019）。

嘉靖十五年秦钺、李舜臣刻本馆藏有限，据范月珍（2019）考证，目前仅上海图书馆有藏。而嘉靖十七年刘储秀据嘉靖十五年秦钺、李舜臣刻本补刻本流传较广，海内外多家图书馆有藏。宁忌浮（2000）整理本即以此本为底本。宁忌浮（2000）指出张鲲、秦钺都是正德进士，李舜臣为嘉靖会元，嘉靖十五年他们都在江西任上。嘉靖十七年，刘储秀来江西，为之补上刘臣翁序，又写了几句跋语附刘序后补刊。故可简称江西本。该本各馆所藏行款基本一致。半页8行，小字双行字数同，大字一约当小字四，每行约22字。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上方记书名卷第，下方则记页次。内容顺序为刘辰翁序、刘储秀跋、张鲲序、凡例、通考、正文，且刘辰翁序、刘储秀跋皆是刘储秀用隶书写成，但刘辰翁序“谓天为
七年（七或八）切”句，虽字体作篆书，但内容与明递修本同，且上文提到的“酈”字亦作“黠”，显然江西本当据明递修本刻。各馆所藏江西本最大区别在于册数不同，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为10册30卷，天津图书馆所藏为16册30卷，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为24册30卷。

6.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天禄琳琅明翻刻本。据李添富（2007）介绍，此本16册30卷。字大，色深，甚为清晰。内容为凡例、通考、正文。无各类序跋。

（三）清刊本

1.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文渊本。该本12册30卷，内容顺序为刘辰翁序、熊忠序、凡例、通考、正文。文渊本对原书多有更改处，或正或误，其价值亦值得肯定。文渊本与明递修本、江西本当为一系，比如“酈”字，同样作“黠”。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2. 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简称荟要本。该本12册30卷，内容顺序为刘辰翁序、凡例、通考、正文。通过与文渊本比较，发现二者所据底本不同。文渊本多与明刻本同，而荟要本多与元刻本同。具体待下文分析。

3. 光绪九年淮南书局重刊本，简称淮南本。此本较为易得，海内外多家图书馆都有收藏，如西南大学图书馆就藏有多套。该本10册30卷，内容顺序为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程桓生序、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宗禁约、凡例、通考、正文、张行孚跋。淮南本卷端亦有“㊂”字天干标记，同时刘辰翁序、熊忠序文字与上文所提到明刻本等表现一致。另外，刘辰翁序“徒罔端以极作述之意如此”句中“端”字最为明显：江西本作“论”。今所见所有明递修本、台北本端字皆缺左半边及上部，只留“而”字下半部分，作“𠀤”状。明刻本则作“端”。这表明淮南本当据明刻本翻刻。

（四）朝鲜刊本

1.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藏朝鲜覆元陈宗刊本，简称奎章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经部第20册所收即为此本。该本13册30卷。8行13字，大字单行，小字双行，大字一约当小字四字，每行约22字不等，四周双边，黑口，双花纹鱼尾，上鱼尾版记卷第，下鱼尾上方则记页次。奎章本版面清

晰，内容精良，错误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元刊本的一些错误的修订（主要是《通考》部分），值得肯定，比如：《通考》去声五勿韵有“(鱼角) 麟”小韵。麟，元刊本、朝鲜本、明刻本、台北本、五山本作“麟”，字体显然不正。江西本、文渊本作“麟”，淮南本作“麟”，而奎章本、荟要本则同《举要》《集韵》玉勿切以及《字韵》一致，作“麟”。奎章本不足地方的就是重新制板而来，失去了元刊本面貌。尤其是刘辰翁序、熊忠序行款、文字与元刊本、明刊本皆不同，陈宗禁约更是体式全改。奎章本内容顺序为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宗禁约、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凡例、通考、正文，最后有德水李植的跋文。朝鲜李植的生卒年为1584-1647年，且其跋文中有“兵火以来，此书公私藏本几泯。幸于校局有板本而亦多缺亡。余取玉堂旧本，比较补苴，锓梓完帙”，所谓“兵火”当指明万历间1592年至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事。再者，考虑到李植于光海君二年（1610）文科及第，后历任官吏曹佐郎、大司成、大司宪、判书等职（左江1999），则李氏之跋文当不早于1610年。因此，此书当是万历（1572-1620）后期或天启（1621-1627）乃至崇祯（1627-1644）年间所刻。

台北“中央图书馆”有一藏本，14册30卷，内容、体例同上，卷末附崔世珍《韵会玉篇》二卷。该本馆藏著录信息为“明嘉靖间朝鲜刊本”。明嘉靖年间，当从1521至1566年，崔世珍的《韵会玉篇》1536年问世（金基石2004），恰为嘉靖后期，或许这就是该本被著录为嘉靖间刊本的原因吧。奎章本李植跋文言“兵火以来，此书公私藏本几泯。幸于校局有板本而亦多缺亡。余取玉堂旧本，比较补苴，锓梓完帙”，可见李植跋奎章本或许就是据“明嘉靖间朝鲜刊本”刊刻的，其后没有附《韵会玉篇》，或许也跟“兵火”有关。

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朝鲜刻本，简称朝鲜本。该本著录信息不详，24册30卷（其中卷19~21配日本刻本），行款、文字与元刊本一致，与奎章本有别，左右双边，无李植跋文。这两个朝鲜本都有一个共同且明显的文字特征，即《通考》页第2行阴文“蒙古字韵音同”，其中的“蒙”字皆作“据”字。韩国学者郑光（2008）认为，朝鲜覆元明刻本“蒙古字韵音同”改为“据古字韵音同”是为了消除元代的影响，有意为之。¹

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朝鲜覆元刊本。据李添富（2007）介绍，该本与明覆刻本相仿，10册30卷。

（五）日本刊本

1. 日本应永五年（1398）（释圣寿）重刻五山版汉籍本，简称五山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日本五山版汉籍丛刊》第一辑中所选就是此本。该本15册30卷，8行13字，大字单行，小字双行，大字一约当小字四，每行约22、23字不等，四周双边，版心黑口，双鱼尾，上鱼尾版记卷第，下鱼尾上方则记页次。内容顺序为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宗禁约、凡例、通考、正文，无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住吉朋彦（1997）指出五山本是据元刊本重刻，保留了元刊本的原貌，并且其最大特点是保留了十多处“或本”的内容，即在版本内容有差异处，用书耳的形式在当页天头、地脚或旁边刻上“或本（作）……”

¹ 参见郑光，《〈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和训民正音》，第2次韩国语学会国际学术大会，Sessional“Hangul和文字”提纲，2008年（转引自田迪，张民权2018）。

的内容，对于研究版本内容差异有重要帮助。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应是同一版本，但未审其内是否有关于“或本”的补版内容。

2. 日本庆长(1596–1615)活字本，日本驹泽大学藏本，简称驹泽本。该本15册30卷，页8行，行23字。内容为张鲲序、凡例、正文，无元刊本诸序及通考。李添富(2007)指出该本以活字印刷，字体大小参差歪斜，板匡较大，文字因而加大，所以非常清晰，鱼尾也很奇特。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台湾故宫博物院等皆有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著录为日本铜活字本，其内容直接起自凡例，后为正文，无张鲲序。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虽亦为15册30卷，但具体每册所含卷数不同，驹泽大学藏本为1、2、3、4-5、6-7、8、9-10、11-14、15-16、17-18、19-22、23-24、25-26、27-28、29-30；早稻田大学藏本为1-2、3-4、5-6、7-8、9-10、11-12、13-14……29-30。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馆藏信息认为该本当是据嘉靖十五年(1536)江西刊本翻刻，此说待考。但比较两本内容可以发现，二者多有不同之处，一般是江西本有误，驹泽本不误，比如：去声十八啸笑韵，江西本有：“拗，于教切，羽清音，戾也……蒙曰韵枷字属皓字母韵”，“蒙曰韵”，误，驹泽本作“蒙古韵”，是；“枷字属皓字母韵”，“枷”，误，驹泽本作“拗”，是。《通考》作“(影皓)拗”(耿军，2013)。

3. 日本重刊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藏。据李添富(2007)介绍，该本亦为活字本，乃据江西本翻刻，最大特点是有日文加注声调及日语文字次第。

4. 日本翻朝鲜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该本10册30卷，内容为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宗禁约、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通考、凡例、正文。该本与朝鲜各本有一共同的文字上的特征，即《通考》第2行“蒙古字韵音同”其中的“蒙”字皆作“据”字。

二、《举要》的版本系统

通过上面版本情况的梳理及简要分析，我们选取较有代表性的、目前所能获取到的、且版本较为精良的上图本、宫内本、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文渊本、荟要本、淮南本、奎章本、朝鲜本、五山本、驹泽本等2个元刊本，3个明刊本，3个清刊本，2个朝鲜刊本，2个日刊本，共12个版本作为版本依据，¹从各版本内容异同的角度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举要》的版本系统、元刊本的面貌以及各版本的价值。

下面重点结合有关序跋文献及各本内容分析《举要》的元刊本的版本和相关版本系统。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了“版本”和“版本系统”。所谓的“版本系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刻”“私刻”“坊刻”系统，而是指根据研究需要，从正文内容上来看有重大不同的即为不同“版本系统”；²同时，在正文内容上没有区别，只是其他方面，如体例、行款、印次、册数等方面有所不同的，只算是不同的“版本”，而不是不同“版本系统”。

(一)《举要》版本系统的几种观点

¹ 其他有关版本也偶有涉及，具体参见“举要版本概述”一节。

² 传统“官刻”“私刻”“坊刻”称为“传统版本系统”，与我们正文内容区分的版本系统不同。当然二者也有一定联系。

吴国武（2012）认为元刻本大体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

元刻本大体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版心无刻工姓名，字体相同，有福建刻书的特点。各本之间的差异，主要为修版印刷的时间、序跋附文次序以及书籍装订册数的不同。

宁忌浮（2000）认为元刊本有两种：

《举要》的元刊本有两种是确切无疑的，一是陈宗刊本（大德本），一是余谦刊本（元统本）……陈宗刊本大概早已失传，余谦刊本即清人所说的元统本，我们也未见到……陈宗本的刊刻时间，可能就在熊忠作序之时或稍后，即大德年间。

范月珍（2019）认为元刊本有三个版本：

元代陈宗刻本一般被认为《举要》的最早刻本。日本河田黑的《静嘉堂秘籍志》、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页德辉的《书林清话》、《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中国古籍总目》等书籍都提到过陈宗刻本……从以上著述可以看出：一是陈宗刻本应该有多传本存世，二是河田黑等人认为陈宗刻本早于余谦校本，书中没有李术鲁翀和余谦二人的序，这个判断标准是通过对序跋解读得来的，传统书目文献的依此标准也无不妥。但是，当代目录学的发展和完善，学者对古籍版本判断坚持证据的客观性原则，而陈宗刻本的判断依据中有推断性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把有余谦二人序跋作为判断不同元刻本的依据之一，但不能作为判断元陈宗刻本的依据。

上述三家观点看似颇有不同。吴国武（2012）“元刻本大体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差异，主要为修版印刷的时间、序跋附文次序以及书籍装订册数的不同”的说法看到了各本之间形式上的区别，并没有从各家序言、正文内容等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范月珍（2019）“可以把有余谦二人序跋作为判断不同元刻本的依据之一，但不能作为判断元陈宗刻本的依据”的观点，是根据“当代目录学的发展和完善，学者对古籍版本判断坚持证据的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意为既然序言等有所不同，自然可以算作不同版本。吴、范二位的着眼点不同，但实际上都没有否认《举要》正文内容实为一个系统。客观看起来，各元刊本其版式、文字、体例等等，确实相差不大，但确实又各有不同，把它们看作一个系统的不同时地的印刷、装订的不同，自然也说得过去，只是其间的细微差别则只能“视而不见”了。

宁忌浮（2000）对元刊本有两个版本的判断以及对元统本基本情况的推测是基本可信的，但对于陈宗刊本与余谦刊本是否为两个版本系统，也没有明确。另外淮南书局刻本所据底本应当是明刊本。上文已提到，淮南书局刻本卷端有“㊣”字天干标记，这是明刊本的显著标记。明刊本与元刊本最大的区别除了这个“㊣”字天干标记外，还有一些细节可以帮助辨别，比如上文提到的明刻本、台北本等所有版本的刘辰翁序、熊忠序字迹与元刊本是完全不同的，

这显然是明人刻书时重写的。¹在正文内容上，明刊本与元刊本的区别就更大了，主要是一些韵字及注释的增删方面多有不同（下文详述）。

（二）《举要》版本内容系统的有关问题

我们认为所有元刊本皆源自同一个祖本（大德陈宗刊本）这自然没错，但并不表示所有元刊本正文内容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元刊本从根本上说源头只有一个版本系统，但因各种原因，如修版印刷的时间、序跋附文次序以及书籍装订册数的不同（吴国武，2012），会导致出现不同版本，正如版本概述一节所提到的上图本与内阁本为同一版本，宫内本与国图本为同一版本，但它们在正文内容上并无明显不同，故仍然属于同一版本系统；但如果出现了“刊正补削”等问题，即正文内容出现了重大改变，即使是在原板的基础上对正文内容进行的补板、修板，然后重印，这样的情况，也应该算是另一版本系统了。

这样看来，上面列出的四个元刊本正文内容基本一致，似乎表明元刊本只有一个版本系统。但事实可能并不那么简单，我们通过梳理有关文献信息及元刊本的流布情况进行说明。

一般认为陈宗刊本（大德本）是最早刊本，其后有余谦刊本（元统本）及其他元刊本。而在陈宗刊本和余谦刊本之间还有一个抄本，这些都在陈宗禁约、李术鲁翀序和余谦题记中有记载：

今绣诸梓，三复讎校，并无讹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之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举要》陈宗禁约）

文宗皇帝御奎章阁，得昭武黄氏《韵会举要》写本。至顺二年春，敕应奉翰林文字臣余谦校正。明年夏上进，赐旌其功。余氏今提学江浙，以书见质，始知其刊正补削，根据不苟。（《举要》李术鲁翀序）

时至顺二年二月己（乙）未，臣钦承帝命，点校葛元鼎所书《韵会》以进。越明年四月丁卯，乃遂讫工献纳。上彻圣鉴，龙赓下班，曷胜感怍！念惟韵版文字乖误颇繁，兹既考征就易，辑具成编。尚获与学，书者咸被于天下同文之休斯愿。（《举要》余谦题记）

从上述陈宗禁约、李术鲁翀序和余谦题记我们可以判断，从传统版本系统概念来说，陈宗刊本是为私刻，余谦刊本则为官刻，二者当为不同版本系统。“葛元鼎所书《韵会》”显然又是据某本抄写而来，而余谦刊本则是葛元鼎写本的修订。

余谦刊本到底据何而来？他依据什么进行修订，又修订了哪些内容呢？

范月珍（2019）解读《静嘉堂秘籍志》“盖公绍在时，已命陈宗刊版，尚未经文宗御览。余谦点校者，故曰系私著之文，已经所属陈告禁约也。至文宗见葛元鼎写本，命余谦以刊本点校，非未见刊本也。”“所谓刊本快覩者，将谓刊余谦所校之本，非谓以前无刊本，此本当是以余谦点校本重刊者，陈宗跋则以旧刊所有仍之耳。”“若谓陈宗所刊，不应有李术鲁翀、

¹ 其中江西本只有刘辰翁序，且是刘储秀用隶书写成。

余谦两序矣。”的话，认为这是对前面两序的解读，说明黄公绍在世时，已经让门人陈宗刊刻了此书，当时此书还未被元文宗看到，余谦在依据葛元鼎写本点校时并非没有刻本，点校葛元鼎本的依据正是陈宗刻本。李术鲁在序文中所说“刻本快睹，盖有待焉”说的是期待余谦点校后将要刊刻的本子，并不是指此前无刻本，期待刻本问世的意思。

《静嘉堂秘籍志》以为余谦点校葛元鼎写本时是有陈宗刊本的，这是可信的。但言至“文宗见葛元鼎写本，命余谦以刊本点校，非未见刊本也。”即元文宗看到葛元鼎写本，命余谦依据陈宗刊本对葛元鼎写本进行点校，这话看起来不错，但细细琢磨，却有不妥。

葛元鼎写本从何而来尚不得而知；陈宗刊本既已成书，当不至于差到不如一个写本正规。余谦等人何至于弃刊本而就写本呢？所以“文宗皇帝御奎章阁，得昭武黄氏《韵会举要》写本。至顺二年春，敕应奉翰林文字臣余谦校正。”“（余谦）钦承帝命，点校葛元鼎所书《韵会》以进”。这两句话虽确实点明余谦点校葛元鼎所书《韵会》，但同样可以有另外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文宗皇帝得到《举要》写本，命余谦对其进行校正，余谦“念惟韵版文字乖误颇繁，兹既考征就易，辑具成编”，然后上进文宗皇帝。试想，余谦会拿什么样的“辑具成编”的作品上呈文宗皇帝？直接在葛元鼎底稿上进行点校？或作独立编辑成册？似都不妥。另外，余谦点校的时间从“至顺二年二月乙未”到“明年四月丁卯”，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仅仅在葛元鼎底稿上点校，恐怕效率很低。另外，李术鲁序说“明年夏上进，赐旌其功。余氏今提学江浙，以书见质，始知其刊正补削，根据不苟。”“以书见质”“刊正补削”“根据不苟”几句话都提醒我们，余谦上进的是相当严谨的“刊正补削”的书。而如果刊刻一本这么大规模的书，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讲求质量，时间倒也不算充裕。所以《静嘉堂秘籍志》所言余谦绝非新刊是有道理的，但余谦却不是依据陈宗刊本点校葛元鼎写本，而是确实有所依据，比如“考征就易”，从而点校了葛元鼎写本，但同时根据点校结果在陈宗刊本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板，即把点校葛元鼎写本的结果通过修改板面的方式呈现在了陈宗刊本上。葛元鼎抄本到底从何而来，确实无可考，¹但现见元刊本当皆是余谦据葛元鼎抄本点校后在陈宗刊本上修板而来，余谦点校必然不是全部依照葛元鼎抄本，更不可能全依陈宗刊本，而是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见解在里面的，所以他才会说“韵版文字乖误颇繁，兹既考征就易”。至于其他所谓二修、三修、四修，不过是修补板面而已，内容上可能并无实质的增删。

这样解释同时可以回答一直困扰我们的两个问题：同是元刊本，为什么有的有李术鲁序和余谦题记，而有的又没有？陈宗刊本不传已是奇特，余谦刊本又皆为修补本，元刊本甚至有二修、三修、四修，是谁又为什么反复修订呢？

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有两种：第一，常规解释。即不同时地的刊印，有的把李术鲁序和余谦题记放进去了，有的则取消了，毕竟李术鲁序和余谦题记不是陈宗刊本原有的，保留或删除，就看刊印者如何取舍。住吉朋彦（1997）也认为李术鲁、余氏二序的附刻乃是补刻

¹ 住吉朋彦（1997）认为葛元鼎所书的为奎章阁本。

时的混用。第二，比较曲折的解释。“至顺二年二月乙未，臣钦承帝命，点校葛元鼎所书《韵会》以进。”这里的“以进”表明余谦已经完成了点校工作并交给皇帝审阅，正常情况下他不可能拿个半成品给皇帝看。而交给皇帝的作品应该就是余谦点校葛元鼎所书《韵会》并在陈宗刊本上改板刊印的本子。既是给皇帝看的，所以保留了陈宗刊本的原貌，即没有李术鲁序和余谦题记。有他们二人的序和题记反倒不妥。余谦又说：“越明年四月丁卯，乃遂讫工献纳。上彻圣鉴，龙赉下班，曷胜感怍！念惟韵版文字乖误颇繁，兹既考征就易，辑具成编。”这段话则点明了，在皇帝审阅、嘉奖完之后他们自然又刊印了，而这次是面向社会的，自然是有了李术鲁序和余谦题记的。但是这第二种解释就不太好理解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修订现象，直到最后一次（四修）才把李术鲁、余氏二序附上。这就需要结合第二个问题来思考。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释，我们首先还是在上文确定的一个假设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因为余谦刊本就在陈宗刊本基础上进行的改板，我们看到的自然都是改板后的刊本，本就没有未改板的余谦刊本。所以与其说余谦刊本，倒不如说就是陈宗刊本的改板本。又加之余谦刊本为官刻本，故而得以大行其道，陈宗刊本不传或逐渐湮灭是自然的。住吉朋彦（1997）指出元刊本是其他各版本的滥觞……较早的印本也有挖改的痕迹，这显然是为了增补举字而对正文加以修改的结果。这样的修改全书共计 11 处，并举“聰、驍、璁、輶”处等字予以证明。至于后面所谓的二修、三修，乃至四修，据目前所见元刊本内容来看，不过是对余谦刊本某些版面进行的修补，并没有太多修改正文内容。住吉朋彦（1997）将各次修订的情况做了详细区分，他说：

……不过在笔者所知的所有元刊本中都存在这些挖改。同时，与上述个别改动不同，原版本还被阶段性地修订。这样的增补修改至少进行了三次。在三修的版本中，包括卷首在内，共增补了十一页。在最后一次增修本（四）修本中，除了之前增补的内容，又增加了李术鲁序、余谦的序言共三页。

可见，所谓元刊本的后修本多数都是在卷首、序言部分的修改，涉及正文内容的不多，所以从正文内容系统上来说，都属于余谦刊本，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元刊本正文内容皆为同一版本系统。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田迪、张民权（2018）认为陈宗刊本是据余谦官刻本私刻而成，但这样很难解释的是，既然有官刻，又何必私刻？既然私刻官书，且既知“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之文籍不同”，即不同与书肆之坊刻以盈利为目的，又何必担心“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而且，今所见各类元刊本，除修板前后之不同外，内容方面实无本质不同，陈宗如此费力地翻刻官书，意义何在？所以，陈宗刊本早于余谦刊本是合理的。

那么，到底余谦刊本修订所据的陈宗刊本（元刊未修本）是否真的不传了呢？既然余谦刊本是在陈宗刊本基础上修板而来，它们正文内容算还是一个版本系统吗？我们认为陈宗刊本并没有失传；从正文内容上来看，余谦刊本与陈宗刊本确实有诸多差异，二者可以算作两个版本系统了。

陈宋刊本在哪儿呢？它就在余谦刊本的底层，如果把余谦改板的内容剔除掉，剩下的一定是陈宋刊本的底板。但是改掉的部分则无法还原了。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另外的版本了。明代刊本、日本刊本、朝鲜刊本，皆言据元刊本覆刻或翻刻，那么他们自然保留了元刊本的面貌。仔细比对这些内容我们发现，这些版本确实与现见元刊本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差异。住吉朋彦（1997）提到日本五山本的版式字样完全取自元刊本，可以说是对元刊本的翻刻，详细考察其正文内容可以发现，此刊本与增修前的元刊本完全吻合。他还指出：

明清前期刊本是对元刊本（未修本）的翻刻，其款式、字样等都与底本近似。

只不过明前期刊本中并没有出现上述元刊本中的十一处挖改，故而能够看到挖改前字注的原貌。……明前期刊本体现了元刊本增修前的面貌。要言之，明前期刊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现存元刊本曾经被修订过。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韵府群玉》序言曰：“进世黄氏所编《韵会》，虽不详于纪事，然非包罗今古者不及此，而犹遗聰、駢、紳、嘶等字。”此序言写于延祐元年（1314），其中提到的“聰、駢、紳、嘶”四字在元刊本的增修本中都被收录了，由此可见之前确有未增修的版本问世。或许正是由于《韵府》序言的指摘，所以才有后来的元刊本增修本问世吧。据此可以推测元刊本乃是在延祐以前刊行的，现行的版本则是径改修补增订的版本，而明前期刊本则是对延祐以前的未修本的翻刻。

住吉朋彦（1997）的说法值得重视。我们倒不认为现见元刊修订本一定是因为受到了《韵府群玉》序言的指摘才修订的，毕竟我们从史料乃至各方面都看不出黄公绍、熊忠修订的迹象，显然是后人修订的。而这个修订者，最有可能的就是余谦，仅仅从余谦元统三年（1335）的题记就可以看出余谦修订本显然晚于延祐元年（1314），他参考《韵府群玉》序言是完全可能的。故而，我们上文说“余谦却不是依据陈宋刊本点校葛元鼎写本，而是确实有所依据，比如‘考征就易’，从而点校了葛元鼎写本，但同时根据点校结果在陈宋刊本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板，即把点校葛元鼎写本的结果通过修改版面的方式呈现在了陈宋刊本上。”这里的“考征就易”所考征的内容当然可以包括《韵府群玉》的序言。

综上，我们认为要离析陈宋刊本，正文内容上明刊本、五山本与元刊本共同之处皆保留，二者差异之处则以明刊本、五山本为主，体例上当然以没有序言和余谦题记的元刊本为主，这样构成的就是陈宋刊本基本面貌了。

（三）《举要》内容系统的差异及源流

上文提到，五山本被认为是据元刊本重刻，保留了元刊本的原貌，并且其最大特点是保留了“或本”的内容，即在版本内容上有差异处，用补版的形式在当页天头、地脚或旁边刻上“或本（作）……”的内容，对于研究版本内容差异有重要帮助。我们发现五山本在有添补的地方，确实存在改板、补板或修板之处，这些添补的地方恰跟元刊本内容有关联。这样的地方全书有多处，因而，我们认为通过离析五山本底本这些添补之处及其他有关修补内容，就可以基本还原陈宋刊本、余谦刊本的原貌，并进而厘清其他各版本的源流关系。现举一例

予以说明：

《举要》平声上一东韵徒东切“潼、橦”字及其注释文字，为表述方便以及直观展示，将出现歧异的地方列出如下：

A类：“a1 潼_{说文水出广汉梓潼北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州华阴县南入垫江又州名潼川府本唐梓潼郡又关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冲XA 榼_{木名花可为布又冬韵}”，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等属A类，荟要本虽为抄本，但形式与内容完全与A类相同。驹泽本因是活字印刷，形式已经大改，但内容与A类完全一样：“潼_{说文水出广汉梓潼北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州华阴县南入垫江又州名潼川府本唐梓潼郡又关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激华山之东后因潼水名关西一里有潼水遂以名关名橦_{木名花可为布又冬韵}”。}}

B类：“b1 潼_{说文水出广汉梓潼北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州华阴县南入垫江又州名潼川府本唐梓潼郡又关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自龙门南向而流冲XB}”，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淮南本等属B类。文渊本因是抄本，形式有变，但内容与B类相同。

C类：“c1 潼_{说文水出广汉梓潼北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州华阴县南入垫江又州名潼川府本唐梓潼郡又关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激华山之东后因关西一里有潼水遂以名关XB}”，这是五山本的面貌，另外，五山本的书耳作：“_或_本_{木名花可为布又冬韵}橦”。

我们分析一下A、B类版本内容的安排是否合理。重点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a2、b2段是否可以成立。第二，“XA 榼_{木名花可为布又冬韵}”在书中是否合适。

唐杜佑《通典》“第一百七十三·州郡三”有：“……有潼关……本名冲关，河自龙门南流，冲激华山东，故以为名。按：……其潼谷关者，因水立称……。”可见a2段据《通典》原文意改写而成，语句文意皆通。宋程大昌《函潼关要志》有：“《通典》曰：‘本名冲关，言河自龙门向南而流，冲激华山之东，故以为名。后因关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关。’”可见b2段与程大昌所记更为接近。但无论依据《通典》原文还是程大昌《函潼关要志》，a2、b2段都是可以成立的，可见两个版本的内容都是有根据的。

“橦”字，《广韵》徒红切：“木名，花可为布。出《字书》又钟幢二音。”《集韵》徒东切：“木名，花可为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徒红切：“木名。又钟江二韵。今圈。”《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徒红切：“木名。释：按《字书》橦木花可为布。”按各类韵书所载情况看，“橦”放在此处也是可以的。

通过上述形式与内容的比较可以发现，除了五山本外，余所有版本皆可划归A、B两类。A类以元刊本为代表，奎章本称据元刊本翻刻，是可信的；朝鲜本著录不详，但也显然是据元刊本所刻。荟要本与驹泽本虽为抄本和活字本，但都保留了元刊本的内容。B类以明刊本为代表，包括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等，淮南本与明刻本同，证明淮南本所据确为明刻本。文渊本形式不同，但内容亦属B类。

最为特别的就是C类的五山本，它其实是个综合本，即综合了A、B类的所有内容而成为这个样子的。首先，比较a1:b1:c1，就会发现a1=c1，即五山本与A类相同。它们与b1的主要差别就在于1（行底）、2（行首）交接处，a1=c1作“又关名通典云”，b1作“今关名通典云”。其次，比较b2:c2，发现二者内容相同，这似乎表明这里五山本又与B类同属一类。但事实是，当我们仔细观察五山本版面的XB处，就会发现它存在着明显的改板痕迹，

“_{言河}_{后因关西}_{XB}_{自龙门南向而流冲}”一段，字体、墨迹都与别处不同，显然是后面修改的。而删改掉的内

容是什么呢？自然就是 A 类的“XA 檻_{木名花可为}布又冬韵”部分。也就是说，五山本在 A 类的底板上，参照了 b2 部分中的“b2_{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自龙门南向而流冲}徽华山之东后因关西一里有灌水遂以名关”进行改板，把 a2(XA) 改成了 c2(XB) 的样子。删掉的“XA 檻_{木名花可为}布又冬韵”部分被作为补充内容刻在了板页的天头处，成为书耳。

那么，为什么五山本底板已经是元刊本了，却又要参照我们目前认为的多为明刊本的 B 类进行改板呢？回到明刊本刊刻的问题上来。各明刊本皆言覆元刻本、明刊元刻本，那它们所认定的元刊本到底又是什么呢？如果是上图本等元刊本，则不会存在内容差异，更不会有在五山本的来回修改。所以，它们参照的显然另有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最可能的就是陈案刊本！明人刊刻《举要》时应该陈案刊本和余谦刊本都见到了，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依据陈案刊本进行刊刻而已。但他们也没有完全忽略余谦刊本，现在的明刊本除了江西本，其他多本所有元人序跋从形式（顺序有些不同、字体也有不同）到内容皆完整保留应该就是明证。所以说 B 类明刻本底本为元刊未修本，我们说 B 类本主要指明刻本为代表的一系，同时暗含了元刊未修本。

综上，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五山本是经过“一、A 改 B，二、B 补 A”这样的修补的。但是，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让人感觉五山本实际上是经过了两次的修补：五山本所用的原始底板是 A 类的元刊本，后来参考 B 类元刊未修本进行了修改，再后来又参考了 A 类版本，把曾经删除的部分补到了板页的书耳上。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只是太过曲折了。住吉朋彦(1997)指出：

在应永刊本中，其余的十处书耳则是比照所谓的“或本”来考证正文的异同。而其加以考证的正是明前期刊本不同于元刊增修本的地方，只是其中对于卷一“體”字的增补没有做出相应注记。显然应永刊本的正文内容与明前期刊本及假定存在的元刊未修本相同，而其书耳部分又与元刊增修本相一致。据此看来，应永刊本貌似是对元刊未修本的忠实翻刻，而实际上还参考元刊增修本做了很多校对。但是仔细考察应永刊本的印面可以发现，在这些考证地方都残留了正文被挖改过的痕迹，其挖改的范围与元刊增修本相一致。这表明应永刊本原本是以元刊增修本为底本翻刻的，在与元刊未修本校对后，本着尊重原文的原则，重新恢复了被删减的字注内容，同时又将增补的字例移到栏外的书耳中了。也就是说应永刊本所体现出的书的底本与校本关系是相反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应永刊本中除了印面挖改的地方之外，其余部分完全沿袭了元刊后修本的特色，而与元刊四修本等后来的刊本在很多细节部分都不同。

上述住吉朋彦(1997)对于五山本的修补意图是我们非常认同的，他同时指出：“应永刊本原本是以元刊增修本为底本翻刻的，在与元刊未修本校对后，本着尊重原文的原则，重新恢复了被删减的字注内容，同时又将增补的字例移到栏外的书耳中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倒是说得通。因为五山本在刊刻时所用底本为 A 类元刊本，修订时又参照了 B 类元刊未修本，为了体现 A、B 两类的全部内容，故而采取在五山本底本基础上删去 A 类部分

内容，补上B类有关内容，同时将A类删去的内容以书耳形式补在书的空白处并以“或本”名之。因此，五山本刊刻底本为A类元刊本，但修订本目的是为还原B类元刊未修本，所以如果不考虑书耳，五山本总体上算是B类。我们同时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恢复元刊未修本面貌，五山本修订时完全可以只把元刊未修本内容刻成书耳，没必要删去原有内容，刻上新的内容，再把删去的内容刻成书耳，这么复杂了。从修订本将A类元刊本称为“或本”，也可见一斑。

另外，因为五山本刊刻时间较早，它所参考的A、B类本子至迟不会晚于明初。住吉朋彦（1997）认为五山本参考的“或本”不会是明前期刊本，它所用的校本应是元刊未修本。从时间上来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说五山本据A类元刊本刊刻，在时间上是可能的；明刻本翻刻所据的元刊本就是未修的陈寔刊本；说五山本据B类修改，不是说它据明刊本修改，而是说它据明刊本翻刻时所据的B类的祖本——元刊未修本修改。这样，从内容和时间上都说得通了。

我们认为，结合元刊本、明刊本，离析五山本内部有关内容，即可得出陈寔刊本内容系统的面貌，从而将其从余谦刊本中剥离出来。同时，如果要再进一步分析各版本的源流情况，则需要综合上面版本概述所列的有关内容，再通过一些细节的补充来证明。可以帮助分析的细节有几个：

1.陈寔禁约各本用字表现不一

诸本皆为楷体，但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五山本等字形一样，而明刻本、明递修本、台北本、淮南本字形为另一种。其中的“寔”“昨”“公”“绣”“编”“改”“翻”“经”“收”等字还明显存在异体或笔画差异之处，如“翻”字，上图本等作“翻”，明刻本等则作“翻”。江西本、驹泽本、荟要本、文渊本无陈寔禁约。

2.刘辰翁序文内容及书写情况各本表现不一

(1) 字体方面：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五山本等为草书，字体一致；明刻本、明递修本、台北本、淮南本亦作草书，字体与上图本等不同；江西本作隶书，为刘储秀补书；驹泽本无刘辰翁序；荟要本、文渊本为抄本，不计。

(2) 个别字句：刘辰翁序“故谓一大为天”一句，明刻本、淮南本作“故谓一大为天”，明递修本、台北本、江西本作“故谓_大为天”；“谓天为七年切”一句，明刻本、淮南本作“谓天为七年切”，而台北本与江西本、文渊本则作“谓天为_七^{（七或八）}年切”。

上文提到，刘辰翁序“徒阅端以极作述之意如此”句中“端”字，江西本作“论”。今所见所有明递修本、台北本端字皆缺左半边及上部，只留“而”字下半部分，作“𢂑”状。明刻本则作“端”。由此我们推测，刘储秀补写刘辰翁序时，可能参考的就是明递修本，甚至张鲲刻书所参考的也是明递修本。

3.熊忠序书写情况各本表现不一

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五山本等为同样字体的行书，与刘辰翁序字体完

全不一样；而明刻本、台北本、淮南本字体则与它们前面的刘辰翁序字体风格一样，显然为同一人手书。江西本、驹泽本无熊忠序。荟要本、文渊本为抄本，不计，且荟要本无熊忠序。

4.《通考》部分细节处各本表现不一

(1) 入声二沃韵，《举要》有“欲俞玉切音与育同”小韵，喻母；《通考》则无此小韵。《通考》虽无“欲”小韵，但在“(晓菊)旭”“(来菊)录”两小韵中间却有一些特殊情况，具体分为四类：上图本、内阁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明刻本、明修本、文渊本作“(喻菊)”“(来菊)录”，“(喻菊)”“(来菊)”连出，中间无空；江西本作“(喻菊) ■”“(来菊)录”，“(喻菊)”后“■”表示此处当有韵字，未审何字，故空；荟要本、淮南本作“(喻菊)欲”“(来菊)录”，“(喻菊)”后补韵字“欲”字，符合此处音韵地位，《举要》本韵恰有“欲俞玉切音与育同”小韵；五山本作“(喻菊)录”，当为刻录时漏掉“(来菊)”，又未审“(喻菊)”与“录”音韵不合导致的。因此，“(喻菊)”后确可补一“欲”字。这样看来，江西本重刻时是有所修改的，不是完全照录。淮南本和荟要本也是有可能参考了江西本的。

(2) 去声十七霰韵，《通考》有“(知建)驥”小韵，驥，元刊本、明刊本、朝鲜本、五山本、文渊本、淮南本作“辗”。奎章本、荟要本及《举要》作“驥”。驥，《集韵》亦作陟扇切，音韵地位合。辗，《集韵》知辇切、尼展切、女箭切，皆不合，当是“驥”之讹。此处荟要本与奎章本一致。查《通考》全篇，奎章本、荟要本表现较为一致的地方达 27 次之多，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荟要本是参考了奎章本的。¹

5.《举要》正文细节处各本表现不一

《举要》各本在字形、用词、标音等细节处都表现出一定的异同情况，兹举上平声数例为证：

(1) 《举要》平声上四支韵幺夷切“翾”字，台北本作“黠”，明递修本、江西本、文渊本皆作“黠”。上面提到，从整体版本系统来说，明递修本与台北本为一系，但从细节处来看，二者仍有不同。

(2) 《举要》平声上四支韵延知切“棟”字注：“《说文》：木名也。《诗》：隰有杞棟。《尔雅》：棟树细而锐，皮理错戾，好丛生山中，可为车辋。”丛，元刊本、五山本等皆误作“聚”。江西本、文渊本作“丛”，不误。按：《尔雅》“棟、赤棟、白者棟”，郭璞注：“赤棟树，页细而岐锐，皮理错戾，好丛生山中，中为车辋。”《说文系传》：“《尔雅》‘棟、赤棟、白者棟’，郭璞注：‘赤棟树，页细而岐锐，皮理错戾，好聚生山中，中为车辋’。”则江西本、文渊本为一系，从《尔雅》作“丛”；元刊本、五山本从小徐本，但误刻“聚”为“聚”。江西本与文渊本《举要》正文多处表现一致，与余诸本有别，二者显然关系较为密切。

(3) 《举要》平声上六鱼韵求于切“鶗”字注：“鶗，雔鶗，鵠鵠也，飞则鸣，行则摇……。”

¹ 《通考》也有不少地方显示奎章本与清刊本表现一致的。比如入声七曷韵有“〔并括〕跋”小韵，跋，奎章本、荟要本、文渊本、淮南本皆作“跋”，似乎表现一致，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一致更多地体现在用字规范方面，并没有特别意义，故而不能说文渊本与淮南本就与奎章本、荟要本是一系的。其他这种情况还有多处。

鵠鸽，元刊本、五山本、朝鲜本、驹泽本皆作“鵠鸽”，但元刊本、五山本、朝鲜本“鸽”字因字形问题，略似“鸽”字，驹泽本“鸽”字形较为明显，而奎章本则直接刻成“鸽”字。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文渊本、荟要本、淮南本皆作“脊令”。可见清刊本或皆参考了明刊本。

(4)《举要》平声上七虞韵孙徂切“苏”字注：“挚虞曰：流苏者，緝鸟尾垂之，若流然，以其染下垂，故曰苏。”流然，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驹泽本、五山本作“流然”，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作“荒然”，文渊本、淮南本作“旒然”。

(5)《举要》平声上七虞韵冯无切“苻”字注：“草名。《尔雅》：苻鬼目，茎似葛，页圆而毛，子如耳珰。”苻草名尔雅苻鬼目，元刊本、朝鲜本、荟要本作“苻草名尔雅苻思白”；五山本作“苻草名尔雅符思白”；明刊本作“符草名尔雅苻思白”；文渊本、淮南本作“苻草名尔雅苻鬼目”。宁校记(2000)¹据淮南本、文渊本及《礼韵》校江西本“符”作“苻”，是。思白，亦误，当从文渊本、淮南本作“鬼目”。按：《尔雅·释草》作：“苻，鬼目……郭云：‘今江东有鬼目草，茎似葛，页圆而毛，子如耳珰也。赤色从生。’”另，圆，《尔雅》作“员”。

(6)《举要》平声上七虞韵窗俞切“刍”字注：“刍……《说文》：刍，刈艸为也。包束草之形。徐曰：此虽从艸，盖是象形。《尔雅》：秆谓之刍。《祭统》“士执刍”注：藁也”。祭统士执刍：士，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荟要本、驹泽本、五山本、江西本、淮南本皆作“士”；文渊本作“王”；明刻本、台北本似作“土”，即下横长于上横，且“土”头部与“祭统”圈号连在一起，这可能就是造成文渊本误抄为“王”的原因。按：《礼记·祭统第二十五》作“士执刍”，则“士”字是。

(7)《举要》平声上七虞韵崇刍切“雉”字注：“音与鉏同……。”鉏，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荟要本、驹泽本、五山本皆作“鉏”；江西本误作“租”，宁校记(2000)据“雉”“鉏”《通考》同音为澄母孤字母韵，改作“鉏”；明刻本、台北本字迹不清，或可被认作“租”，这当是江西本误作“租”的原因；文渊本、淮南本作“徂”，不当。

上述多处细节的情况有助于将A类系统与B类系统区分开，并帮助判断B类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第一，明刻本、淮南本当是同一小类，淮南本当是据明刻本所刻。第二，明递修本、台北本、江西本、文渊本为一小类。从整体内容系统上来看，台北本与明递修本系列算是同一小类下的不同类型，个别细节处二者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别对于鉴别其他版本如江西本、文渊本有参考价值。第三，江西本、文渊本所据当是明递修本，同时文渊本显然也是参考了江西本的。第四，荟要本最主要继承了奎章本，《通考》部分参考了江西本的内容，但《举要》正文部分则仍属元刊本系列。第五，荟要本、文渊本、淮南本等清刊本应当是参考了明刊本的。文渊本与淮南本多有表现一致之处，可能是淮南本参考了文渊本所致，也可能二者同源自明刊本所致。但是这条不能绝对，毕竟晚近的版本可能参考的前代版本很多。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荟要本仅有的刘辰翁序言内容与文渊本同，但这并不影响二者为不

¹ 宁忌浮整理出版《古今韵会举要》，后附校勘记，简称“宁校记”。参见：(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宁忌浮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同版本系统的结论，同为四库本，它们用同样的序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提要部分都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四库本编修时应该是见到其他元刊本的，上文已述，从内容系统上看，荟要本是与元刊本为一系的，甚至可能直接参考奎章本的，所以才会出现两种四库本在内容上有所差别，在细节上有异同的现象。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出 A、B 两类版本的内容系统和源流情况，具体如下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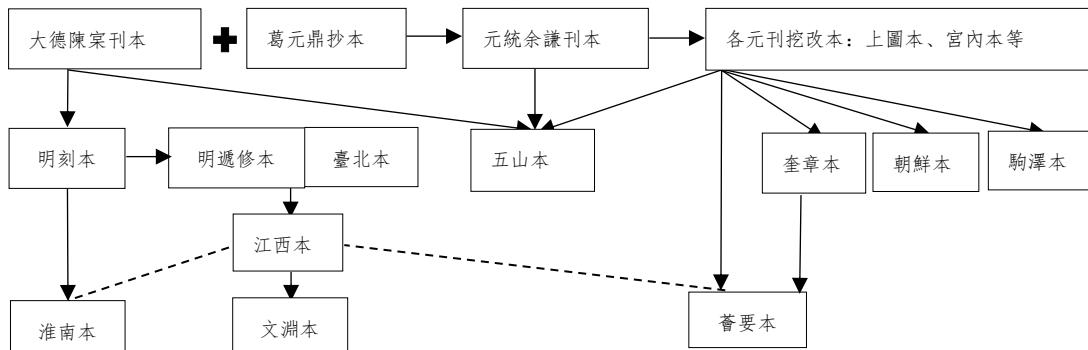


图 1 A、B 两类版本的内容系统和源流情况图

上述 A、B 两类版本的内容系统和源流关系对于判定《举要》各版本系统的价值也有重要意义，比如驹泽本在修正其他版本错误上、文渊本在文献保存上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耿军 2013、2023）。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四、《举要》元刊未修本的具体面貌

目前我们所见的《举要》元刊本包括上图本、静嘉本、内阁本、宫内本、国图本等皆为元刊后修本。无关乎内容的板面修改并不影响对《举要》内容的认识和使用，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地方的内容是有修改的，这样的话我们必然要考虑，这些元刊本未修之前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上面我们已经系统离析了 A 类元刊本与 B 类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还原元刊未修本原貌的办法。根据我们的分析，在 A 类元刊本的基础上，比较它们与 B 类明刻本的异同，参考五山本书耳所补充的内容，就基本可以还原元刊未修本的原貌了。这个元刊未修本，我们主张就是大德陈宗刊本。因此，大德陈宗元刊本内容系统的具体面貌可以作如下分析：

（一）非内容系统的分析

1. 行款情况

鉴于 A 类元刊本皆是在元刊未修本底本上修订的，故行款主要依据上图本等元刊本。

¹ 这种分类从大多数内容上来说是可以的，但少数细节处仍存在一定的交叉现象。比如平声八齐先齐切“澌”字注：“澌，《说文》：散声也。本作澌：从广，斯声。徐曰：若今谓马鸣声为澌也。今作澌，《周礼·内饔》‘鸟臚色而沙鸣’注：沙，澌破也。”沙澌破也：A 系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驹泽本及 B 系台北本、文渊本等作“沙澌破也”。其后为“嘶马鸣”“撕提撕也”。A 系荟要本及 B 系明刻本、江西本、淮南本等作“沙澌也声破也○毛氏韵增”；B 系五山本作“沙澌也声破也毛氏韵增”（板面有明显挖改痕迹），并于天头补书耳“或本嘶马鸣”。这二者后面皆没有“嘶马鸣”，直接是“撕提撕也”。按：《周礼·天官·内饔》“鸟臚色而沙鸣”注：沙，澌也（《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0.）。这三类情况表明，总体上 A、B 两系是不乱的，但 B 系台北本、文渊本与 A 系混，A 系荟要本与 B 系混。荟要本、文渊本属清刊本，后起刊本，参照 A、B 两系皆是有可能的，故这种偶有的例外，并不能说明问题。唯有台北本，上文已经述，它与明刻本有差别，或许也是参考了 A 系。五山本属特例，挖改明显，故可不计。

上图本30卷(册数不定,元刊本有10册、15册、16册、20册等。册数多为印次不同所致或装订所需,不作为判断版本系统的主要依据),半页8行,小字双行22、23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陈寔禁约四周双边,无栏线。

2.顺序情况

内容顺序主要依据上图本、五山本顺序,作: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寔禁约、凡例,通考、正文。无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记。

3.文字情况

刘辰翁序、熊忠序、陈寔禁约、凡例、通考、正文等各部分字体、字号等皆依上图本,辅以五山本。刘辰翁序为草书,且其中“故谓一大为天”“谓天为七年切”两句皆作大字,无小字;熊忠序为行草;陈寔禁约,有异体现象,如“翻”字不作“翻”字。

4.版式/板面情况

主要为非正文内容版式或板面的情况。举一例较为明显之处说明:

《举要》二十一卷终“古今韵会举要卷之二十一”字样处:

A类元刊本“古今韵会举要卷之二十一”字样在该页第2行,内閣本本页前3行中第1、2行右侧行线中间偏下为白板,第3行右侧行线清晰,第4行至第8行皆白板。五山本“古今韵会举要卷之二十一”字样同为第2行,第1、2行右侧行线清晰,第4行至第7行行线亦为阴文,且第4行有“石见四丁修”阴文字样。可见五山本或是据A类元刊本内閣本刊刻而来。同时,上图本前三行边线清晰,第4行至第8行皆白板。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或许元刊未修本底本就与上图本、内閣本一样。

(二) 内容系统的分析

上图本综合五山本所列“或本”内容修改的地方,辅以明刻本所得即为元刊未修本原貌。上图本等元修本基本是在底本上修板、改板而来,对于底本的内容增删不一,故根据五山本“或本”内容判断修板的范围,再辅以明刻本确定增删的具体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上图本等后修本对底板的修补不限于五山本“或本”所指出的内容,其他地方、包括有些板面不清楚或脱落之处亦有修补,但不影响整体内容。

1.根据五山本有关“或本”修订所确定的元刊未修本面貌

住吉朋彦(1997)指出五山本共有11处修改的地方。我们统计发现,实际上一共有12处值得关注的地方,今开列如下,并一一讨论:

(1) 平声上一东韵徒东切“潼、橦”处,本条上文已举例说明,今不避重复,再次列举以说明修补情况。另,如无特殊情况,所列内容分别取自上图本、明刻本、五山本。其中上图本属A类元刊本;上文提到,明刻本所据底本当为元刊未修本,B类实际包含元刊未修本、明刻本,故有时特别指明B类元刊未修本、B类明刻本。C指五山本。

A: 潼说文水出广汉梓潼北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阴县南入垫江又州名潼川府本唐梓潼郡又关 [另行] 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冲冲本名花可为激华山之东后因潼水名关布又冬韵 榼……;

B: 潼说文水出广汉梓潼北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阴县南入垫江又州名潼川府本唐梓潼郡今关 [另行] 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自龙门南向而流冲激华山之东后因关西一里有潼水遂以名关 榼……;

C: 潼 说文水出广汉梓潼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州 [另行] 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XB 自龙门南向而流冲一**潼**……。

五山本“XB”处墨迹、字形与别处不同，显然为补板所致，书耳补“**或**木名**潼**可为布又”。A类元刊本此处无明显修补痕迹，但各本韵字“**潼**可为布又冬韵”为本名花。上图本、五山本正文“又关名通典云”句同，B类则作“今关名通典云”。由此可以判断，五山本刻书所据底本当为A类元刊本，后修者据B类元刊未修本改“XB”处，同时据A类元刊本将删除的“**或**木名花可为布又冬韵”部分补作书耳。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1) 潼 说文水出广汉梓潼界从水童声水经注今华州 [另行] 名通典云本名冲关言河自龙门南向而流冲**潼**……。

(2) 平声上一东韵敷冯切“**覃**、**麌**”处：

A: **覃** [另行] 方言**覃** 陈楚之郊谓之蕡齐鲁谓之蕡关西谓之蕡青赵 [另行] 郭璞曰菘菜陆云**覃**熬麦周礼 菁一名须一名葑**麌**其实蕡蕡○冯……；

B: **覃** [另行] 方言**覃** 陈楚之郊谓之蕡齐鲁谓之蕡关西谓之蕡青赵 [另行] 郭璞曰菘菜陆仙云蕡菁似菘 菁而小有台一名葑一名须又冬韵○冯……；

C: **覃** [另行] 方言**覃** 陈楚之郊谓之蕡齐鲁谓之蕡关西谓之蕡青赵 [另行] 郭璞曰菘菜陆云**覃**熬麦周礼 菁一名须一名葑**麌**其实蕡蕡○冯……。

上图本“**麌**熬麦周礼”处板面断裂明显，显然是补板所致。五山本则无明显痕迹。此处上图本与五山本皆有“**麌**熬麦周礼”内容，故五山本不再有书耳。“蕡菁”，五山本作“蕡青”。明刻本最后有“又冬韵”句，查冬韵方谷切有：“葑，蘋草也。注见东韵蕡字。”A类元刊本“**麌**熬麦周礼”处明显的补版说明我们前文的判断是没错的，即A类元刊本也不是余谦等人重新刊刻的，而是在大德陈宗元刊未修本的基础上修改的。五山本原据A类元刊本刻成，可能修订时因故保留了此处“**麌**熬麦周礼”的内容，也可能是未发现此处的不同，导致既已有“**麌**熬麦周礼”，自然无须补板，故五山本此处无补板痕迹。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2) **覃** [另行] 方言**覃** 陈楚之郊谓之蕡齐鲁谓之蕡关西谓之蕡青赵 [另行] 郭璞曰菘菜陆仙云蕡菁似菘 菁一名须一名葑又冬韵○冯……。

(3) 平声上一东韵麌从切“**聰**、**驁**、**聰**”处：

A: **聰** 说文察也从耳忽声一曰耳病晋股仲**聰**马青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

B: **聰** 说文察也从耳忽声书洪范听曰聰一曰耳病晋股仲 [另页另行] 篆通作忽汉书郊祀志忽明上达**聰**……；

C: **聰** 说文察也从耳忽声书洪范听曰聰一曰耳病晋股仲 [另页另行] 篆通作忽汉书郊祀志忽明上达**聰**……”。五山本两边另加书耳：“**或**本**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

上图本“**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处挖改明显，黑口处有断裂痕迹。五山本同样位置有断裂痕迹，“**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墨迹、字形与别处不同，且同时又有书耳“**或**本**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可见五山本底本原无“**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段，当是A类元刊本面貌：“**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修订时据B类元刊未修本作“**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同时据以补书耳“**聰**马青**聰**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3) **聰** 说文察也从耳忽声书洪范听曰聰一曰耳病晋股仲 [另页另行] 石之似**聰**裁囚**聰**……。

(4) 平声上二冬韵诸容切：“**虍**、**虩**”处：

A: 蟎 虫名蛇蝎又见
本韵蛇字注 举角 ○……；

B: 蟎 虫名蛇蝎又见 平水 ● 韵增 ○……；

C: 蟎 虫名蛇蝎又见 平水 ● 韵增 ○……。

A类元刊本此处无明显修补痕迹，但墨迹略轻，两侧栏线也多有模糊处。五山本“见本韵
蛇字注”平水”几字墨迹明显不同，且天头有书耳“或本韵增”。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4) 蟎 虫名蛇蝎又见 平水 ● 韵增。

(5) 平声上二冬韵常容切：“舡、庸”处：

A: 舡…… [第五行] 音容后人以舡为餚字而餚 痘 傷 痘……；

B: 舡…… [第五行] 音容后人以舡 字不复用又音为餚字而餚 傷……；

C: 舡…… [第五行] 音容后人以舡 字不复用餚字又餚 音餚取懒意也 傷……。

A类元刊本此处无明显修补痕迹，但“庸”字“庸”旁的字体与“舡、𠙴”明显不同，似非出自同一人手。五山本“字而餚 取懒 义也”几字字体乃至墨迹都有明显不同，且天头有书耳“或本庸
病”。五山本小字注“……而餚字不复用餚字又音……”与明刻本“……而餚字不复用又音……”比较，多出“餚字”两字，从文意来看，当删。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5) 舡…… [第五行] 音容后人以舡为餚字而餚 傷。

(6) 平声上四支韵丘奇切：“踦、踦”处：

A: 蒼 说文一足也从足奇声广雅胫 [另行] 也广韵脚跛也方言梁楚之间物体不具者谓之踦又纸韵内 趺 长足虫蜘蛛也 倚……；

B: 蒼 说文一足也从足奇声广雅胫 [另行] 也广韵脚跛也方言梁楚之间物体不具者谓之踦又纸韵内 趺 长足虫蜘蛛也 倚……；

C: 蒼 说文一足也从足奇声广雅胫 [另行] 也广韵脚跛也方言梁楚之间物体不具者谓之踦又纸韵内 趺 长足虫蜘蛛也 倚……。

A类元刊本注文“体不具者谓之踦又纸韵内”处上栏线断裂明显，韵字“踦”之“大”旁亦与别处不同。五山本“物体”及“谓之”的“之”字字形不清，上边线处隐约可见修补痕迹，正文较元刊本多“雍梁之间置支体不具者谓之踦”几字，“又纸韵内”处少一个“内”字，少一个韵字“踦长足虫
蜘蛛也”及其注释字，在天头补书耳“或踦长足虫
蜘蛛也”。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6) 蒼 说文一足也从足奇声广雅胫 [另行] 也广韵脚跛也方言梁楚之间物体不具者谓之踦又纸韵内 倚……。

(7) 平声上八齐韵先齐切“澌、嘶”处：

A: 滩 说文散声 从𠁃斯声徐曰若今谓马鸣声为也本作 滩嘶也今作澌周礼内饔鸟臚色而 [另行] 沙鸣注沙 滩破也 嘶 鸣撕……；

B: 滩 说文散声 从𠁃斯声徐曰若今谓马鸣声为也本作 滩嘶也今作澌周礼内饔鸟臚色而 [另行] 沙鸣注沙 滩破也 ●毛氏韵增 嘶……；

C: 滩 说文散声 从𠁃斯声徐曰若今谓马鸣声为也本作 滩嘶也今作澌周礼内饔鸟臚色而 [另行] 沙鸣注 声破也 毛 滩嘶……。

A类元刊本韵字“嘶 鸣”及其上下位置的两边栏线模糊。五山本上端边线断板明显，“毛氏韵增”前无“●、外有圈”，格式明显与体例不同（当为前有“●”号、阴文字），显为后补；天头补书耳“嘶 鸣”；且注文“（周礼内饔鸟臚色而）沙鸣注沙 滩也声破也毛氏韵增”处与明

刻本“（周礼内饔鸟臚色而）沙鸣注沙澌也声破也●毛氏韵增”内容与格式都不同；该行小字注文第二列首字“声”字及其前后几字的字体显然不同。《周礼·天官·内饔》“鸟臚色而沙鸣”《注》：沙，澌也。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7) 淒 说文散声 从𠂔斯声徐曰若今谓马鸣声为 沙鸣注 [另行] 沙澌也 声破也●撕……。
也本作 瘦嘶也今作澌周礼内饔鸟臚色而 毛氏韵增

(8) 平声上十一真韵升人切“伸、绅”字处：

A：伸 [另行] 说文届伸也从人申声广韵舒也又直也又礼记君子欠伸 [另行] 假借也易屈信相感左传善者信矣通作申庄子 绅 大带；
注频申也疏云志倦则欠体疲则伸经典或作信说文徐曰 翼奉传欠伸动于貌毛氏曰古惟申字后加立人也；

B：伸 [另行] 说文届伸也从人申声广韵舒也又直也又礼记君子欠伸 [另行] 假借也易屈信相感左传善者信矣通作申庄子熊经鸟申
注频申也疏云志倦则欠体疲则伸经典或作信说文徐曰 翼奉传欠伸动于貌毛氏曰古惟申字后加立人以别之；

C：伸 [另行] 说文届伸也从人申声广韵舒也又直也又礼记君子欠伸 [另行] 假借也易屈信相感左传善者信矣通作申庄子 [空]。
注频申也疏云志倦则欠体疲则伸经典或作信说文徐曰 翼奉传欠伸动于貌毛氏曰古惟申字后加立人。

A类元刊本“绅_{大带}”左侧边框有明显断板痕迹。B类此处有“熊经鸟申”字样¹。五山本此处为空白，板面脱落明显，可以想见，此处脱落的内容应当是“绅_{大带}”，而不会是“熊经鸟申”。因五山本此处既无文字，其他部位也无书耳“绅_{大带}”，最可能的解释是五山本最后印刷时脱落了这部分内容，因为是补板，脱落是很正常的。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8) 伸 [另行] 说文届伸也从人申声广韵舒也又直也又礼记君子欠伸 [另行] 假借也易屈信相感左传善者信矣通作申庄子熊经鸟申
注频申也疏云志倦则欠体疲则伸经典或作信说文徐曰 翼奉传欠伸动于貌毛氏曰古惟申字后加立人以别之。

(9) 平声下一先韵于虔切“薺、嫣”字处：

A：薺 说文烟也从艸焉声广 [另行] 嫣 長 鄡……；
韵物不鲜也又愿韵物

B：薺 说文烟也从艸焉声广 [另行] 餏 也 又 鄡……；
韵物不鲜也增韵食物

C：薺 说文烟也从艸焉声广 [另行] 餏 也 又 鄡……。
韵物不鲜也增韵食物

A类元刊本“嫣_長”似有改板痕迹，不明显，但其上一行最后几字作“又愿韵物”，显然“物”字言未尽。五山本“增韵食物餏也又愿韵”几字字迹显然不同，且天头有书耳“嫣_長”。按，《举要》去声十四愿韵无“薺”韵字；《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平声下二仙韵于虔切：“薺，烟也。食物餏也。翫也。亦作烟。又愿韵。今圈。”去声二十五愿于虔切：“薺，烟也。物不鲜也。翫也。又臭草。又仙韵。”则A类元刊本作“又愿韵物”，其下一行改作“嫣_長”字，当是把“物”后注文小字删除改作“嫣_長”了。根据《增韵》判断，“嫣_長”处改前当为“不鲜也又愿韵”。因此，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9) 薺 说文烟也从艸焉声广 [另行] 不鲜也 鄡……。
韵物不鲜也增韵物

A类元刊本修改“不鲜也”作“嫣_長”，但B类明刻本刊刻时发现此处存在的问题，据《增韵》加以修正，连同前面的“又愿韵物”及“不鲜也”一起改作“…… 增韵 食物 [另行] 餏 也 又 愿 韵”。五山本据A类元刊本刊刻时，一开始应当保留了原貌，修订时则据B类元刊未修本加以修正，故五山本“增韵食物餏也又愿韵”几字字迹显然不同。因此，我们说此处元刊未修本的原貌为(9)，但因其有误，故当改作：(9') 薺 说文烟也从艸焉声广 [另行] 餏 也 又 愿 韵……。且其中的小字注文“增韵

¹ 此处出现一个例外。驹泽本在别处都显示与A类上图本等一致，但唯此处不同，它兼有A类上图本系列与B类明刻本系列的内容，即“伸”字的注释有“熊经鸟申”“以别之”字样，同明刻本系列，又有“绅_{大带}”韵字及注释，同上图本系列。驹泽本后起，参照两种类型是有可能的，这并不影响整体上的分类。

“食物鶡也又愿韵”当标点为：《增韵》：“食物鶡也，又愿韵。”即“又愿韵”句，当为《增韵》内容，而不是《举要》内容，《举要》愿韵无“薦”韵字。

(10) 平声下六麻韵披巴切“葩、葩”字处：

A: 蕉
披巴切宫次清音说文华也从艸^肥^浮^芭……；

B: 蕉
披巴切宫次清音说文华也从艸^肥^芭……；

C: 蕉
披巴切宫次清音说文华也从艸^肥^芭……。

A类元刊本小字□处明显空一字，为挖改所致。“肥^浮^芭”右边线处亦明显断板，这两处都是明显修补痕迹。五山本在□处为“声”字，与上一行末尾“从艸^肥”文意合，且该“声字”与“是^{从艸^肥}”等字字迹明显与别处不同；又“增韵”不作B类“●增韵”，与A类显同。则五山本显然据A类底本刻，故保留“增韵”字格式，修订时据B类元刊未修本补“声”字，删“肥^浮”，补“是^{从艸^肥}”，同时又据A类元刊本补书耳“肥^浮”。因此，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10) 蕉
披巴切宫次清音说文华也从艸^肥^芭……。

另，《增韵》平声下九麻韵：“葩，披巴切。花也。又草花白。又华貌。《韩文诗》‘正而葩’。古作芭。”则若从《增韵》，“作芭”，当改作“古作芭”，故当据B类明刻本改作(10')葩
披巴切宫次清音说文华也从艸^肥^芭……。“增韵”前是否有“●”号，从《举要》体例看并不统一，故暂不加。这样也符合A类元刊本底本为元刊未修本的说法。明刻本为覆刻，与参照本有所不同，可以理解。

(11) 上声十一轸韵巨陨切“箇、𧈧”字处：

A: 篇
说文箇露也从竹困声一曰博綦集韵 [另行] 箴注^{贝大而筭也}𧈧者𧈧○；

B: 篇
说文箇露也从竹困声一曰博綦集韵 [另行] 之菌注竹筭也欧○；

C: 篇
说文箇露也从竹困声一曰博綦集韵 [另行] 之菌注竹筭也欧○；

A类元刊本“箇^{贝大而筭也}𧈧者𧈧”上端边缘明显有板面断裂痕迹，补板明显。五山本“之菌注竹筭也欧^{阳诗菌筭比羔羊}”栏线不清，无明显修补痕迹，顶端边缘略浅并附书耳“或^{贝大而筭也}𧈧者𧈧”。综合以上A、B、C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11) 篇
说文箇露也从竹困声一曰博綦集韵 [另行] 之菌注竹筭也欧○

(12) 上声十六铣韵上演切“憲、𡇠”字处：

A: 憲
行动貌汉相如賦^{除地祭}𡇠^{白𡇠}鱗……；

B: 憲
行动貌汉相如賦象與憲𡇠于西清^{除地祭}𡇠^{白𡇠}鱗……；

C: 憲
行动貌汉相如賦象與憲𡇠于西清^{除地祭}𡇠^{白𡇠}鱗……。

A类元刊本“𡇠^{除地祭}”墨迹与别处不同，右边有明显断板痕迹，注文“象與憲𡇠于西清”墨迹似乎也有些与别处略有不同。五山本此处无修补痕迹，右侧有书耳“𡇠^{除地祭}”。B类与五山本形式与内容一致，看不出五山本修改痕迹，似乎与前面的规则不同，显示五山本有可能不是以A类元刊本为底本，而是以B类元刊未修本为底本。这里暂时存疑。最可能的解释

就是五山本此处因有其他原因，比如板面缺失、不便修补等，因此直接将整版做了修改。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五山本所据 A 类元刊本原本此处并无修改，我们所见的上图本等 A 类元刊本是后来修改的。不管怎样，五山本仍符合形式面貌与 B 类元刊未修本接近，后又补书耳的规则。综合以上 A、B、C 三类情况，我们得出元刊未修本此处的具体面貌为：

(12) 僨_{行动貌汉相如赋象舆婉俾于西清又寒早韵●毛氏韵增}鱗……。

2.根据正文个别文字内容确定的元刊未修本面貌

上述五山本 12 处内容属于有较为明显差别地方，仔细阅读全文，可以发现还有很多内容都能体现出五山本与现见 A 类元刊本相同而与 B 类明刻本不同之处。这些内容对于离析出元刊未修本面貌也是有帮助的。这样的内容较多，我们仅举数例予以说明：

(1) 平声上一东韵丘弓切：芎，《说文》本作营：“营蔚，口草也。从艸，宫声。”……□，A 类元刊本、五山本皆作“杏”；B 类明刻本作“香”。从 A 类元刊本、五山本此处板面来看，并无修改痕迹，故此处元刊未修本的面貌为：芎，《说文》本作营：“营蔚，杏草也。从艸，宫声。”按，《说文》：“蔚，香艸也。”则明刻本改作“香”字为是。

(2) 平声上三江韵胡江切：虹，潐也，《诗》“实虹小子”，郑康成读。又东送绎韵。●毛氏韵增别出口字。□，A 类元刊本、五山本作“江”；B 类明刻本作“江”。从 A 类元刊本、五山本此处板面来看，并无修改痕迹，故此处元刊未修本的面貌为：虹，潐也，《诗》“实虹小子”，郑康成读。又东送绎韵。●毛氏韵增别出江字。按，《增韵》一东胡公切：“𧔧，蟠螭。《汉志》作虫。《诗》“实虹小子”。与江同。又江绎送三韵。”则 B 类明刻本等作“江”字，误。

(3) 平声上四支韵延知切：棯，《说文》：木名也。《诗》“隰有杞棯”。《尔雅》：棯树细而锐，皮理错戾，好口生山中，可为车辋。辋，车轮外围也。●礼韵续降。□，A 类元刊本、五山本皆作“聚”；B 类明刻本作“丛”。从 A 类元刊本、五山本此处板面来看，并无修改痕迹，故此处元刊未修本的面貌为：棯，《说文》：木名也。《诗》“隰有杞棯”。《尔雅》：棯树细而锐，皮理错戾，好聚生山中，可为车辋。辋，车轮外围也。●礼韵续降。按，《尔雅》“棯、赤棯、白者棯”，郭璞《注》：“赤棯树，页细而岐鋒，皮理错戾，好丛生山中，中为车辋。”《说文系传》：“《尔雅》‘棯、赤棯、白者棯’，郭璞《注》：‘赤棯树，页细而岐鋒，皮理错戾，好聚生山中，中为车辋’。”则 A 类元刊本、五山本从小徐本，但误刻“聚”为“聚”；B 类明刻本从《尔雅》作“丛”，是。

(4) 平声上四支韵相支切：斯，相支切，音与私同。《说文》：“析也。从斤，其声。”引《诗》“斧以斯之”。《尔雅》：“□”一曰：此也。又……□，A 类元刊本、五山本作“斯侈离也”；B 类明刻本作“斯后离也”。从 A 类元刊本、五山本此处板面来看，并无修改痕迹，故此处元刊未修本的面貌为：斯，相支切，音与私同。《说文》：“析也。从斤，其声。”引《诗》“斧以斯之”。《尔雅》：“斯，侈离也。”一曰：此也。又……按，《尔雅·释言第二》：

“斯、謬，离也。”《注》：“齐、陈曰斯。謬，见《诗》。○謬音侈。”《疏》：“斯、謬，离也。○释曰：斯，析。謬，张。皆分离也。孙炎曰：‘斯，析之离。’郭云‘齐、陈曰斯’者，《方言》文。《陈风·墓门》云：‘斧以斯之。’是也。云‘謬，见《诗》’者，《小雅·巷伯》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郑笺云：‘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是也。謬、侈音义同”。可见，A类元刊本、五山本因“謬”“侈”音义同，故以“侈”代“謬”，但从释义角度看，“侈(謬)”算衍字，可删；而B类明刻本作“后”显为误抄。当改正作“斯，离也”。

(5) 平声上十四寒韵：○□a，逋□b 切，宫清音。《博雅》辈也。一曰部也。《增韵》又党也。□a，A类元刊本、五山本作“麌”；B类明刻本作“燔”。□b，A类元刊本、五山本作“潘”；B类明刻本作“燔”。从A类元刊本、五山本此处板面来看，并无修改痕迹，故此处元刊未修本的面貌为：○麌，逋潘切，宫清音。《博雅》辈也。一曰部也。《增韵》又党也。按，逋潘切，宁校记(2000)据《集韵》改作“逋潘切”，是。A类元刊本、五山本作“逋潘切”，不误。

3. 根据《通考》个别现象所确定的元刊未修本面貌

《通考》是《韵会》不可分割的部分，二者关系尚未有定论，但至少目前所见绝大部分版本二者都是共现的，从《通考》内容所见，也可以窥见元刊未修本的一些面貌。兹举一例：

上文已提到，入声二沃韵《举要》有“欲俞玉切音与育同”小韵，喻母；《通考》则无此小韵。《通考》虽无“欲”小韵，但在“(晓菊)旭”“(来菊)录”两小韵中间却有一些特殊情况，具体分为四类：上图本、内阁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明刻本、明修本、文渊本作“(喻菊)”“(来菊)录”，“(喻菊)”“(来菊)”连出，中间无空；江西本作“(喻菊) ■”“(来菊)录”，“(喻菊)”后“■”表示此处当有韵字，未审何字，故空；荟要本、淮南本作“(喻菊)欲”“(来菊)录”，“(喻菊)”后补韵字“欲”字，符合此处音韵地位，《举要》本韵恰有“欲俞玉切音与育同”小韵；五山本作“(喻菊)录”，当为刻录时漏掉“(来菊)”，又未审“(喻菊)”与“录”音韵不合导致的。因此，“(喻菊)”后确可补一“欲”字。这样看来，江西本重刻时是有所修改的，不是完全照录。淮南本和荟要本也是有可能参考了江西本的。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确定元刊未修本《通考》此处当为“(喻菊)(来菊)录”。当然，考虑到编撰本意，(喻菊)后当可补一“欲”字。

以上根据五山本修补最后呈现的情况，结合A类元刊本及B类明刻本的行款、文字、顺序、内容、板面等综合考察就可以厘订出元刊未修本，我们称之为大德陈宋刊本的基本面貌。根据上文的分析，实无余谦新刊本，所谓A类元刊本实际是据元刊未修本底本修订而来，五山本则据A类元刊本刊刻，后又据元刊未修本修订并将删除内容以“或本”形式用书耳呈现，B类明刻本以元刊未修本为底本覆刻，虽遵循其基本体式和内容，但仍有差异或不同之处。要完美呈现元刊未修本面貌，行款、文字、顺序、板面等方面，多以A类元刊本为主，辅以五山本来确定；在各本差异较大的正文内容方面，多以明刻本为主，辅以五山本及其“或本”内容来确定；在其他个别文字内容方面，则多以A类元刊本为主，辅以五山本，

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其正误，确定版本的实际面貌。

五、小结

上文简述了《举要》的馆藏及版本著录情况，并根据版本的代表性、内容的完整性以及使用的可及性几个方面综合选取了上图本、宫内本、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荟要本、文渊本、淮南本、奎章本、朝鲜本、五山本、驹泽本等2个元刊本，3个明刊本，3个清刊本，2个朝鲜刊本，2个日刊本，共12个版本作为版本依据，从各版本内容异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了《举要》的版本系统、还原了元刊本版本面貌，并对各版本的价值进行简单评述。

通过细致分析发现，有些版本的文献著录及馆藏信息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可以通过版本内容系统予以纠正；目前所见元刊本系统较为一致且皆为修补本的原因在于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余谦新刊本，它实际上是余谦在陈寔刊本的底本上进行的修订，其后的二修、三修、四修，也没有改变底本，只是个别版面的修补；陈寔刊本实际是存于余谦刊本、各类明覆元刊本、朝鲜覆元刊本以及日本覆元刊本中的；结合元刊本、明刊本，离析五山本内部有关内容，即可得出陈寔刊本内容系统的面貌，从而将其从余谦刊本中剥离出来；从传统版本系统来说，陈寔刊本系私刻，余谦刊本为官刻，它们自然为两种版本系统；从正文的总体内容系统上来说，上图本、宫内本、奎章本、朝鲜本、荟要本、驹泽本为一系，五山本、明刻本、台北本、江西本、文渊本、淮南本为一系。另外，淮南本多与明刻本类同，当是据明刻本所刻；台北本与明递修本实为一类，皆是明刻本不同时期的修板，但台北本与明递修本在细节而上有所不同；江西本、文渊本与台北本在细节上的差别也与明递修本类似，故江西本、文渊本当是据明递修本刊刻或抄录而来。五山本算是较为特殊的一系，但排除书耳内容后，它当算作与明刻本等为一系的。

根据A、B、C三类版本的行款、文字、顺序、内容、版式/板面等综合考察就可以厘订出元刊未修本，我们称之为大德陈寔刊本的基本面貌。要完美呈现元刊未修本面貌，行款、文字、顺序、版式等方面，多以A类元刊本为主，辅以五山本来确定；在各本差异较大的正文内容方面，多以明刻本为主，辅以五山本及其“或本”内容来确定；在其他个别文字内容方面，则多以A类元刊本为主，辅以五山本，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其正误，确定版本的实际面貌。

参考文献

- (汉)许慎. (2004). 说文解字.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 中华再造善本. 北京图书出版社.
-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赵伯雄整理. (2000). 周礼注疏. 十三经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李传书整理. (2000). 尔雅注疏. 十三经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南唐)徐锴. (1987). 说文解字系传. 道光祁嵩藻刻本. 中华书局.
- (清)段玉裁著. 许维贤, 整理. (2015). 说文解字注. 凤凰出版社.
- [日]河田黑, 撰. 杜泽逊等, 点校. (2016). 静嘉堂秘籍志. 日本大正6年(1917)卷三. 日藏中国古籍书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日]住吉朋彦. (1997). 元刊本系《古今韵会举要》传本解题——以本邦中世期汉学研究为目的. 王慧荣, 译.

- 日本汉学研究(第一号).日本五山版汉籍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宋)陈彭年(1982).宋本广韵.张氏重刊泽存堂藏版.中国书店.
- (宋)程大昌.函潼关要志.说郛.明末刻本.
- (宋)丁度等.(2003).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宋绍定三年藏书阁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宋)丁度.(2013)宋刻集韵.宋淳熙十四年金州军刻本.中华书局.
- (宋)毛晃增注.(2003)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元至正十五年日新书堂刻明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唐)杜佑.通典.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朝鲜刻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元版汉籍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日本驹泽大学藏活字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日本内阁文库藏元刊本.
- (元)黄公绍,熊忠.(2014).古今韵会举要.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藏朝鲜覆元陈宗刊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元)黄公绍,熊忠.(2012)古今韵会举要.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刊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上海图书馆藏元刊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覆元刻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天津图书馆藏嘉靖十七年刘储秀补刻本.
- (元)黄公绍,熊忠.(2018).古今韵会举要.应永五年日本重刻本.日本五山版汉籍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西南大学藏光绪九年淮南书局重刻本.
- (元)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重庆图书馆藏温陵许国诚润州公署重修本.
- (元)黄公绍,熊忠.(2005)古今韵会举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社.
- (元)黄公绍,熊忠.(1987)古今韵会举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元)黄公绍,熊忠.(2000)古今韵会举要(宁忌浮整理).中华书局.
- (元)阴时夫,阴中夫.韵府群玉.元元统二年梅溪书院刻本.
- 范月珍.(2019).《古今韵会举要》版本考略.晋图学刊, (6), 59-66.
- 耿军.(202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古今韵会举要》的语言文献价值初论.汉学与国际中文教育, 4(1), 1-7.
- 耿军.(2013).元代汉语音系研究——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中心.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胡玉缙撰.王欣夫辑.(199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书店出版社.
- 金基石.(2006).崔世珍与韩国李朝时期的汉语文教育.汉语学习, (4), 76-80.
- 李添富.(2007).《古今韵会举要》之撰著与版本.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68-87.
- 李添富.(1990).古今韵会举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研所.
- 田迪,张民权.(2018).《通考》异文与《韵会》编校问题.中国语言学报, 18, 191-207.
- 吴国武.(2012).《古今韵会举要》影印说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1989).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 左江.(1999).朝鲜李植《杜诗批解》的产生背景.杜甫研究学刊, (2), 58-65.

(责任编辑: 吴虹燕、刘洁)